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成机制论析

武文豪, 岳松君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有着严密的生成机制。从发生认识论的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业已存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观为其提供理论前提,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鲜活实践为其提供现实依据,为马克思主义正本清源的坚决斗争为其提供重要契机,作为理论主要创立者的习近平同志个人难能可贵的坚定信仰、理论素养和求实精神等优秀品质为其提供主观依托。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观;生成机制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20)05-0005-05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元问题进行深刻睿智的理论思考,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许多具有新的时代特点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逐步形成了系统完备、逻辑严谨、层次分明、意蕴丰富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观。当前,学术界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成果已经初具规模,但研究视角却较为单一,多数局限于对这一理论的内容体系进行逻辑架构,而鲜有从发生认识论的视角对其进行追本溯源的深入探讨。本文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马克思主义所作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主要文本依据,充分吸纳借鉴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试从理论前提、现实依据、重要契机、主观依托四个维度来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成机制,以期有效拓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视域、丰富研究成果,从而帮助人们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刻地理解和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真谛。

一、理论前提:业已存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观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

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669}同样,人们创造自己的理论,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只有在充分承继前人科学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才能创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在充分承继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业已存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观的基础上而得以生成的。

自19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一直都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马克思几乎没有使用过“马克思主义”这一语汇,甚至对于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者”作出“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2]585}的有力回击。恩格斯对于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评价也多带有否定、讽刺意味。但无论是为阐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还是为回应外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质疑,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和书信中都或多或少地表达过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观。譬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即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说法)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1]413-414}。他反对别人将他的学说教条化、神圣化,在致卢格的一封信中提出“不主张我们树起任

收稿日期:2020-05-1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样性文化生态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构研究”(15YJC71003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研究”(18ZDA00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文化向度研究”(18CKS044);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科研创新项目“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哲学基础研究”(2020ZD004)

作者简介:武文豪,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岳松君,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何教条主义的旗帜”^{[3]7}的观点。恩格斯主要从发生论、出发点、特征论和价值论等维度^{[4]4-7}阐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5]664}。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新的马克思主义观。列宁创新性地指明马克思主义“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同革命性结合了起来”^{[6]3},其伟大功绩是“向各国无产者指出了无产者的重要作用、任务和使命就是率先起来同资本进行革命斗争”^{[7]291},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渊源、内容构成、价值功能、理论特质等方面作出经典阐释,为中国共产党人形成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提供了重要启迪。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相应的马克思主义观。其中,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李大钊从“历史论”“经济论”和“政策论”^{[8]18}三个维度来阐释马克思主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相对全面系统地认识马克思主义。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接力推进,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也日益深化。毛泽东同志深刻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9]296}。他强调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10]534},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光辉历史命题,在恢宏壮丽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新中国成立后,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我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之际,他敏锐地意识到苏联模式的弊端,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科学地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向全党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11]23}的历史任务,在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有力地拓展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准确把握新时期新阶段时代课题的新变化,紧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理性考量马克思主义所处的时代新境遇,创立、坚持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在接续推进理论创新的过程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与研究,既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不丢掉“老祖宗”,旗帜鲜明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守正出新的理论创新进程中逐渐形成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元问题的新的独到见解。2018年5月4日,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系统回顾了波澜壮阔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多次援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杰出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经典论断,并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进一步丰富发展之,初步建立起习近平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观的理论架构。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业已存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观一脉相承、薪火相传、与时俱进,既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也是共产党人接续推进理论创新、形成新的马克思主义观的逻辑起点和历史素材,成为习近平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观赖以生成的理论前提。

二、现实依据: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鲜活实践

黑格尔认为:“理论的东西本质上包含于实践的东西之中。”^{[12]13}确如此言,任何科学的思想理论,其生成和创新都必然要立足于一定的实践基础,都要在充分聚焦、研析和破解人类社会发 展难题的实践中才能逐步形成和发展。正所谓“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11}同样,理论在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生成,从根源上讲,是因为这个国家在特定时代条件下有相应的实践需要。质言之,实践需要是理论创新的原动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是一个相辅相成、良性互动的辩证统一过程。一方面,实践创新催生理论创新,为理论创新提供动力源泉;另一方面,理论创新推动实践创新,为实践创新提供思想引领。作为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习近平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观,正是我们党在研析时代课题、回应时代关切、破解时代之问、推进实践创新的治国理政进程中逐步形成的。

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百年不遇的大发展、大变革和大调整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经40余年的曲折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态势,迈进了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作为立足时代之基、回应时代之问的科学真理,马克思主义所处的时代语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由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于此境遇下,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要肩负起新的光荣而艰巨的理论使命。首先,

从宏观层面讲,站在新时代的历史坐标上,伴随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人类向何处去”“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以及“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13]2-7}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无法规避而又必须回答的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其次,从微观层面讲,我们党在新时代推进治国理政的鲜活实践中,也面临着诸多需要在理论上作出新的回答与诠释的更为具体的时代课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以“六个如何”^①作出了相对全面系统的概括。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将这一系列的时代课题进一步凝练概括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4]15}。在此基础上,他多次深刻强调,“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15]26-27},推动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革,必须要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的接力探索中寻觅中国社会发展的奥妙与真谛。此外,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党在带领人民接力推进民族复兴伟业的壮阔历史征程中、在治国理政的鲜活实践中,积累了许多弥足珍贵的“中国经验”,这些“中国经验”有待于我们党在新时代条件下对其进行理论升华,使之“马克思主义化”,从而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光添彩。

毋庸置疑,新时代,我们党在治国理政的鲜活实践中,无论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析和破解时代课题,还是创新性地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抑或对“中国经验”进行理论升华、与时俱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都必然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在理论上重新审视和思考“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元问题。换言之,必然要形成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而习近平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观正是在这样的实践需要与时代境遇下应运而生的。

三、重要契机:为马克思主义正本清源的坚决斗争

列宁曾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中深刻指出,作为一种学说,马克思主义“在其生命的途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16]148}。诚如斯言,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也彰显着浓郁的斗争色彩,而这种斗争

在一定意义上也成为科学马克思主义观向前发展的重要契机。譬如,马克思在面对自己的学说被人们主观主义地认识和对待时,他引用德国作家海因里希·海涅的名言,尖锐地批评“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5]603}。在同各种教条主义、修正主义的理论斗争中,马克思公开地阐明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在“火星派”同“反火星派”、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激烈斗争中形成、丰富和发展的。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在同党一定时期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之错误倾向的斗争中逐渐走向成熟的。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在同党内盛行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和“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社会上盛行的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毛泽东思想以及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上蔓延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等错误观念和思潮的斗争中得以丰富和发展的。

习近平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和发展也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曲折的斗争过程。如果说革命和建设年代,教条主义倾向是马克思主义需要着力突围的主要理论困境,那么,改革开放以来,敌对势力的曲解贬损、左右夹击则成为马克思主义需要有力回击的严峻理论挑战。并且,这一理论挑战在新时代尤为突出。一方面,自20世纪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来,国际社会出现了“社会主义低潮综合征”,一些歪曲、诋毁和否定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陈词滥调一直不绝于耳、甚嚣尘上。例如: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大肆鼓吹其所谓的“历史终结论”,高调宣判“马克思主义已死”;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则认为其所谓的“文明的冲突”已经取代马克思主义所阐明的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因而得出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已经过时的武断结论。此外,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论等打着“自由”“民主”的幌子而实质上却竭力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暗流涌动、时有抬头。特别值得警惕的是,近年来一些诸如“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曲解、贬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奇谈怪论再度沉渣泛起,更有人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然歪曲定性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新官僚资本主义”^{[17]110},等等。另一方面,伴随文化多元化特别是社会信息化的时代潮流,在敌对势力错误思潮的推波助澜下,马克思主义主流话语体系的认同在国内受到一定冲击,社会上对马克思主义“存在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受到一定的挑战。具体而言,在现实中,对马克思主义持“过时论”“无用论”“终结论”的观点有之,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的现象有之,马克思主义“失语”“失踪”“失声”的问题有之^{[18]10}。

毋庸讳言,上述问题之所以存在,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便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他们以一系列错误思潮误导民众、蛊惑人心,推行其别有用心“颜色革命”。同时,部分人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微,缺乏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因而轻信各种不实言论,甚至不负责任地盲目迎合、传播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错误思潮的泛滥提供了现实的温床。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曾一针见血地批评道:“有的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没读几本,一知半解就哇啦哇啦发表意见,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也有悖于科学精神。”^{[18]12}在此境遇下,习近平总书记以坚定的理想信念、非凡的政治勇气和深邃的理论智慧为马克思主义“正名”,对各种奇谈怪论作出了鞭辟入里的剖析与批驳,同各种错误思潮进行了正本清源的坚决斗争。他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层面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成逻辑、发展历程、本质特性、理论功能、历史作用、当代价值、未来命运等诸多方面作出新的系统阐释,充分揭示出新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所彰显的强大真理力量和光明发展前景,精辟论述了科学社会主义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源流”关系,以一系列无可辩驳的科学论断对各种曲解和置疑作出了深刻透彻的理论回应、进行了精确有力的理论匡正。正是在这种为马克思主义正本清源的坚决斗争中,习近平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观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四、主观依托:习近平同志个人难能可贵的优秀品质

任何一种科学思想理论的创立,除了要依托于必要的理论前提、实践依据等客观条件,还必然要依托于理论创立者自身的主观条件。习近平同志个人难能可贵的优秀品质成为研究习近平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观生成机制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作为习近平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观的主要创造者,相比一般人而言,习近平同志至少具备如下优秀品质:

第一,红色家风孕育的坚定信仰。习近平同志生于革命家庭,受其父母和众多革命老前辈崇高革命风范的影响与熏陶,很小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习仲勋同志教育子女要“既勇于‘向上攀登’,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又勤于‘向下深入’,广泛联系群

众和实际”^{[19]425},等等。作为一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习仲勋同志的家风无疑是红色的家风,其中渗透着革命的政治胸怀、工作作风、生活作风、学习理念和处世原则。这种红色家风对习近平同志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深远影响,使得青少年时期的习近平同志就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朴素的认同感、对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产生了朴素的亲和感、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产生了朴素的使命感。这种朴素的认同感、亲和感和使命感成为习近平同志日后自觉学习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而形成科学马克思主义观的情感根源。

第二,扎实厚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少年时红色家风的耳濡目染、成年后工作实践的理论需要,使得习近平同志一直高度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钻研。早在梁家河的七年知青岁月中,他就利用劳动之余的时间持久而深入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下了很大功夫去阅读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20]44}。不仅如此,他还大量阅读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尤其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的系列著作,理论视野不断拓宽。到地方从政后,习近平同志将马克思主义同工作实践相联系,深刻体悟出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21]159}。这一精辟论断所蕴含的思想真谛,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与理解日益精深。此外,他还攻读了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学位,并出版《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思考》等学术著作,理论水平得到进一步跃升。担任总书记后,习近平同志更是率先垂范、躬身力行,号召全党同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先后五次主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要内容的集体学习活动^②。长期的理论钻研使习近平同志具备扎实厚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这为其形成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第三,实事求是的求实精神。习近平同志实事求是的求实精神来源于他丰富珍贵的实践经历。习近平同志是从群众中走来、从中国基层逐级历练出来的人民领袖。“中国的西部、中部、东部地区都待过,党和国家各个领导层级都干过,农民、大学生、军人、干部都当过。”^{[20]450}并且,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习近平同志以身作则,充分发扬实事求是的求实精神,秉承“实践第一、实干为要”的为政原则,在工作

中尤为注重开展调查研究活动,要求自己也要求身边工作人员“要有眼睛向下的决心和甘当小学生的精神”,要经常“迈开步子,走出院子,去车间码头,到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调研”^[22]¹⁵⁴,从而更好地体察民情、了解实情、把握国情。丰富珍贵的实践经历使得习近平同志对中国国情有着深刻的把握、对群众疾苦有着深刻的体悟、对在中国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如何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着更深刻的见地,这成为习近平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观不容忽视的重要主观成因。

注释:

- ①“六个如何”分别是:如何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如何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如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如何提高改革决策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如何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参见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7.
- ②五次集体学习活动的主题分别为:“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2013年12月3日)、“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2015年1月23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2015年11月23日)、“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影响”(2017年9月29日)和“《共产党宣言》及其时代意义”(2018年4月23日)。参见王衡.论习近平科学社会主义观的内在逻辑与基本特征[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9(2):20-25.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周向军.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观:基本内容与重要意义[J].理论学刊,2006(8):4-7,128.
-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6]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7]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8]李大钊.李大钊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1]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 [12]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 [13]王伟光.开辟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境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 [14]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5]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16]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 [18]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19]习仲勋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 [20]中共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7.
- [21]习近平.摆脱贫困[M].厦门: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 [22]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 文 川]